

杭世骏与雍正《浙江通志·经籍》的纂修*

王宣标

提 要: 1731年,杭世骏受聘参修《浙江通志》,负责该志《经籍》的编纂。但在杭氏志稿成编之后,似乎遭到同局史官的不少批评,引发杭氏的不满。杭氏意欲以《两浙经籍志》为名而“别本单行”,惜未见有传本存世。后世学者对杭氏遭遇多持同情态度,梁启超甚至认为杭氏志稿“被局员排挤削去”。但是,将《两浙经籍志序》与今本雍正《浙江通志·经籍》的类例进行对比,可以证明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则梁氏此说不可全信。

关键词: 杭世骏 雍正《浙江通志·经籍》 《两浙经籍志序》

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流传过程中,杭世骏道古堂藏本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它上承朱彝尊藏本,下启吴騫校本。^①而杭世骏从关注《千顷堂书目》到购藏、再到校补工作的展开,都与他参与编修《浙江通志》有密切关联。杭世骏在《黄氏书录序》有明确说明:“江宁黄俞邠氏,搜辑有明一代作者,详述其爵里,门分类聚,比于唐宋《艺文志》之例。予披览粗竟,窃叹俞邠用力之勤,而悲其志之不得试也……辛亥春,不佞修《浙志·经籍》,需此书甚亟。”^②又在《千顷堂书目跋》中说:“岁在辛亥,从曝书亭朱氏购得此本,亟录出以箴史官之失。”^③不难看出,在《浙江通志》开局之初,杭世骏就认定《千顷堂书目》是他当时最为急需的参考文献。

但杭世骏编纂《浙江通志·经籍》(以下简称《经籍》)的过程似乎并不顺利,他满腹牢骚的抱怨文字至今保留在他的文集之中,以致引发后世学者对杭世骏不平遭遇的普遍同情,甚至有学者指出今存《经籍》已不是杭世骏的原作,这无疑对我们今天深入研究《经籍》造成了一些困扰。因此,有必要对杭世骏编纂《经籍》的相关问题重新梳理,以厘清《经籍》著作权的最终归属。

—

雍正《浙江通志》280卷^④,是现存浙江省志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因其体例完善,历来为学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千顷堂书目》研究”(项目编号:14YJC87002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史艺文志》五种文本研究”(项目编号:15CTQ014)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张明华:《黄虞稷和千顷堂书目》,“从朱彝尊藏《千顷堂书目》本到杭世骏道古堂增补本”,第148—153页;“从道古堂藏本到吴騫校本”,第178—182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

② 杭世骏著,蔡锦芳、唐宸点校:《杭世骏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8页。按,“辛亥春”原作“辛酉春”。但雍正《浙江通志》开局编纂在雍正九年辛亥(1731),因此有学者认定原文中的“辛酉”应是“辛亥”的讹误,今改。

③ 杭世骏著,蔡锦芳、唐宸点校:《杭世骏集》,第1394页。

④ 今存雍正《浙江通志》版本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19—526册);嘉庆十三年(1808)重刊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浙江书局覆刻本(商务印书馆据以影印,1934年);中华书局标点本(题“清雍正朝《浙江通志》标点本”,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2001年)。本文主要依据中华书局标点本。

者所推崇。《四库全书总目》卷68著录说：“国朝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兼管浙江、江南总督嵇曾筠等监修……此本于雍正九年辛亥总督李卫开局编纂，迄乙卯而告竣，曾筠等具表上进。司其事者，原任侍读学士沈翼机、编修傅王露、检讨陆奎勋也。总为五十四门，视旧志增目一十有七。所引诸书，皆具列原文，标列出典。其近事未有记载者，亦具列其案牘，视他志体例特善。其有见闻异辞者，则附加考证于下方。虽过求赅备，或不无繁复丛冗；然信而有征之目，差为不愧矣。”^①以上对雍正《浙江通志》编修过程、参与人员、结构体例作了简要介绍，肯定其“体例特善”，可见评价颇高。因此，《四库全书》全文抄录雍正《浙江通志》，可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9—526册。

从体例来看，雍正《浙江通志》共分为54门，“较前志增加十七个门类：所增《经籍》和《碑碣》两门，尤为详赡”^②。其中的《经籍》门，在《浙江通志》卷241至卷254，一共14卷，详尽著录了历代浙人的著述，始于先秦，迄至清初，以经（上、下）、史（上、下）、子（上、中、下）、集（一至五）、两浙志乘（上、下）排列，次序井然。从《经籍》所引的繁复文献以及严整的分类体例，可以推测其编纂者具备深厚的目录学素养，并为编纂工作付出了艰辛努力。

二

杭世骏（1696—1772），字大宗，号荃浦，浙江仁和人。雍正二年（1724）举人。乾隆元年（1736）应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晚年以直言罢官，后主广东越秀、扬州安定书院。所撰《道古堂文集》48卷、《诗集》26卷。《清史列传》卷71有传。杭氏长于经史，且嗜好聚书。王瞿（字曾祥）在《道古堂文集序》中就夸赞说：“荃浦于学诚无所不贯，所藏书拥榻积几，不下千万卷。荃浦枕籍其中，目睇手纂，几忘晷夕。闲过友人馆舍，得异文秘册，即端坐默识，括略其要实乃已。”^③杭氏家筑道古堂藏书楼，晚年再建补史亭，藏书之富闻名一时。

杭世骏参与编修《经籍》的前后经过，《两浙经籍志序》一文记载得非常详细。这篇序文篇幅甚长，节引如下：

雍正辛亥春，制府礼聘名硕，修浙省全志。予以简劣，谬从诸老先生后，磨铅濡卓，得与于编削之役。《经籍》一志，所创稿也……阅月凡九，乃克成编。为卷五，为目五十有九，为书一万五千有奇。方之前志，订讹补阙，其亦略备也已。

无何，制府朝京，局事大变。狐凭虎以作威，蜮含沙而射影。檄取成书，妄生弹射。谓时令、地理非史，天文、律历非子；食货不宜别标宝货、器用，医家不宜更分经方、针灸。树颐胥而插齿牙，沸吼吹唇，牢不可破。予援四代史志及《崇文》、昭德、莆田、鄱阳之书以证之，益复中其所畏，倡为鸱张狼顾之谈，以济其鸱鸢腐鼠之吓……凡兹数说，转丸飞钳，恫疑虚喝。当局秉笔者舌舐颈缩，大有戒心，肆意涂窜，无复詮整。艾儒魁士之述作，以疑似而见删；家猷国献之章程，因运移而并废。续凫断鹤，取笑通人，今世所行本是也。予复移书中用事者，责其匡正大指，言经籍之设，所以补列传阙漏……诸余史

①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607页。

② 洪焕椿：《浙江地方志考录》，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8页。

③ 王瞿：《道古堂文集序》，《杭世骏集》，第6页。

体倮指不胜，反复申明，盖将以救也。之人亦复牵于时势，依回迁就，二三其德，是书遂不可复矣。呜呼，余生孱馹，哄堂斗穴，本所不关。因次旧稿，别本单行，聊述其颠末若此。^①

序文中详细描述杭氏为修纂《经籍》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以及随后遭来诸多无端指责。对此，章学诚颇为感慨地说：“按，杭所称制府，李公卫也。予在京师，见朱竹君先生家藏各省通志，其体例以《浙江通志》为最，即李公所修本也。此事见于雍正年间朱批奏折。李公当日请动公帑万金，彼时物力不甚艰难，一切人功、食用、剗鬲，较今殆省倍蓰。而请帑万金，优礼厚币，征名贤也。杭于史学未为深造，然才雄学富，一时未易其俦。《浙志》体例优于他部，殆其力欤？而小人涛张，遽已如此。苍蝇变乱黑白，虽李公之裁断，犹不能禁于暂去之际，群邪丑正，从古然矣。”^② 从中可以看出章学诚对杭氏修志工作的肯定，以及对其不平遭际的深切同情。

此后，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却认为：“乾隆初年之《浙江通志》，其《经籍》一门出杭大宗手，而卒被局员排挤削去。大宗虽别录单行，然今竟不可得见矣。”^③ “乾隆初年”是指《浙江通志》在乾隆元年七月间进呈御览。梁氏认为《经籍》原为杭世骏所撰，但后来“被局员排挤削去”，杭氏原稿虽“别录单行”，今已不见流传。需要说明的是，梁氏举杭世骏参修《浙江通志》的例子，意在重点说明方志编纂形式“率沿唐后官局分修之旧”而造成的弊端，即所谓“领其事者皆垂老之显宦，不知学问为何物；分纂人员猥滥，无所专责。虽有一二达识，不能尽其才”^④。但他的说法可能衍生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雍正《浙江通志·经籍》应是削去杭氏稿之后，由其他局员重新编撰而成，与杭氏原稿应该不是同一部目录了。对此，如果结合《浙江通志》纂修背景来重新考察，或许能对梁氏的说法进行验证。

三

《浙江通志》的纂修始于雍正九年（1731）二月，时任总督李卫奉命开局，“闻命之下，哀罗典籍，延礼儒绅，设馆授餐”^⑤，以“原任侍读学士沈翼机、编修傅王露、检讨陆奎勋”总裁其事。当时还是举人的杭世骏，被荐分纂《经籍》。至雍正十年八月李卫移督直隶之前，《浙江通志》稿本已成，一共280卷。其后程元章、王国栋等继为总裁，直至嵇曾筠乾隆元年七月间进呈。从杭世骏《两浙经籍志序》来看，至迟在李卫朝京之前，由他分纂的《经籍》已经成编，即从雍正九年二月开局算起，阅九月成编，是在当年十一月间。但正如杭世骏所说，在李卫离开浙江后，“局事大变”，或有人对《经籍》提出诸多指责，以致引起杭世骏的强烈不满。杭世骏虽据理力争，仍无济于事，最终只好“因次旧稿，别本单行”以示抗议。

① 杭世骏著，蔡锦芳、唐宸点校：《杭世骏集》，第86—87页。

② 章学诚：《读道古堂文集》，章学诚著，刘公纯标点：《校雠通义·外篇》，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74—75页。

③ 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68页。

④ 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第367页。

⑤ 李卫：《敕修浙江通志·序》，雍正《浙江通志》，中华书局，2001年，第6页。

按照修志的一般程序,《浙江通志》稿本纂成之后,书局的编纂工作应已大致结束,继而进入由总裁负责的删削阶段。如果仅是诸位史官之间对目录的体例存在不同看法而斟酌商榷,自是情理中事。但从杭氏的叙述来看,批评者似乎对目录学并不精通,而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来主持裁定。这是由于《浙江通志》的编纂本来就是奉诏敕修,以备将来《一统志》采择之用,因此主持者有种种顾虑。

杭世骏将《两浙经籍志》单行,清人多有记载。如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著录杭氏著述说:“余若《史记北齐疏证》,暨《历代艺文志》《两浙经籍志》《续经籍考》等遗稿,均不可得矣。”^①梁启超也说“大宗虽别录单行,然今竟不可得见矣”。单行的《两浙经籍志》已无法得见,那么今存《浙江通志·经籍》是否真如梁启超所说,是杭氏原稿“被局员排挤削去”而后由另人重撰的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浙江通志》卷首所附的《敕修浙江通志纂修职名》中,其“分修”下有“浙江甲辰科举人、候选知县,臣杭世骏”^②,尚列杭世骏的名字在其中。这不禁使人产生联想,当时情形是否真如杭氏序文中所说的那么严重。确实,杭世骏或许与某些纂修官就《经籍》的体例曾起激烈争执,甚至总裁取杭氏成稿加以删削以致杭氏非常不满;但如果仅依杭氏一家之言,便断言其“高材不容,多齟齬之者。遂去,独成《艺文志》若干卷”^③。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公允。

依据杭世骏《两浙经籍志序》,可以推测杭氏《经籍》原稿概貌,列之如下。

其一,《两浙经籍志序》中说:“檄取成书,妄生弹射。谓时令、地理非史,天文、律历非子;食货不宜别标宝货、器用,医家不宜更分经方、针灸。”即批评者对杭氏《经籍》原稿的类例设置提出的不同意见。如果杭氏原稿真被削去,那么重撰的《经籍》对以上类例应当重新调整。但核对今本《浙江通志·经籍》,“时令”“地理”二类在卷244“经籍史部下”^④;“天文”“历算”二类在卷247“经籍子部下”^⑤;卷244“经籍史部下”中“食货”类下有“货宝”“器用”之属^⑥;卷247“经籍子部下”中“医家”类下有“针灸”“方书”之属^⑦。可见,从以上类例来看,今本雍正《浙江通志·经籍》仍然保存着杭氏稿的原貌,未见明显调整,更不存在由于“妄生弹射”后重新设置类例的情况。

其二,杭氏《经籍》原稿成编时,“为卷五,为目五十有九,为书一万五千有奇”。统计今本雍正《浙江通志·经籍》卷目如下:

卷241 经籍经部上:易;书;诗;春秋(凡4目)

卷242 经籍经部下:礼;乐;孝经;论语;孟子;经解;小学(凡7目)

卷243 经籍史部上:正史;霸史;杂史;实录;时政记;编年;运历;纪录;史论;史

①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第219页。

② 雍正《浙江通志》,第27页。

③ 钱仪吉:《赧市杂记序》,《衍石斋记事稿》卷3,《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1508册,第536页。

④ 雍正《浙江通志》,第6770、6788—6795页。

⑤ 雍正《浙江通志》,第6852、6853页。

⑥ 参见雍正《浙江通志》,第6771页。

⑦ 参见雍正《浙江通志》,第6865、6860页。

抄（凡10目）

卷244 经籍史部下：故事；时务；职官；时令；食货；仪注；刑法；传记；谱牒；地理；簿录（凡11目）

卷245 经籍子部上：儒家；道藏（凡2目）

卷246 经籍子部中：释藏；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凡7目）

卷247 经籍子部下：兵家；天文；历算；五行；医家；杂技术；类书（凡7目）

卷248 经籍集部一：别集

卷249 经籍集部二：别集

卷250 经籍集部三：别集

卷251 经籍集部四：别集

卷252 经籍集部五：制诰；表奏；启札；策论判；骚赋；乐府；总集；文史（凡8目）

卷253 经籍两浙志乘上

卷254 经籍两浙志乘下

可见，《经籍》采用的是常见的三级分类结构，总分为五“部”，“部”下分“目”，“目”下再分“属”。每“目”直接标明目名，“属”则以“右××”以示说明。举例来说，经部“经解”目之下，自“《四书解》六十五卷”至“《四书辨疑》”，注明“右四书”；自“《五经钩沉》十卷”至“《五经要论》”，注明“右群经”。也就是说，经部“经解”目下分“四书”“群经”二属。其体例特善，前贤多见推崇。

唯一存在疑问的是，在卷253、254“两浙志乘”下未注明“目”名，却直接列有23“属”，依次是：郡邑、山川、古迹（以上“经籍十三”）；学校、兵制、海防、海塘、水利、赋役、盐法、积贮、物产、祠庙、寺观、杂记、题咏、艺文、宦迹、传记、家传、家谱、年谱、释道（以上“经籍十四”）。^①显然与《经籍》其余各卷体例不合。因此笔者推测，这二卷的“目”名或在传抄中不慎脱去。所幸还有线索可供考证。

据《浙江通志》卷首所附《敕修浙江通志·凡例》第31条：“浙省名贤著作如林，虽中多散佚，第就见闻所及者，依《隋书·经籍志》例，分经史子集，注明氏里卷数，以便考核。其‘地志’‘传记’二种，凡系于浙事者，亦得附载。”^②也就是说，《经籍》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外附载一部，此部分为“地志”“传记”二种，这应该就是附载的“两浙志乘”部下的两个“目”。核对“经籍十三”、“经籍十四”所列的23“属”，“宦迹”之属之前的18属应归入“地志”目，余下5属应归入“传记”目。如此结构安排，才符合《经籍》全篇的体例。

因此，可以将杭世骏《两浙经籍志·序》所述与今本雍正《浙江通志·经籍》进行对照，借以理解《经籍》的类例结构。杭氏所言“为卷五”，应与五部相对应，即经、史、子、集各一卷，外附载“两浙志乘”一卷。而“为目五十有九”，正好与《经籍》经部11目、史部21目、子部16目、集部9目、两浙志乘2目的总数相吻合。今本《浙江通志·经籍》虽拆分成14卷，不是“为卷五”的分卷，但类例与杭氏旧稿并无明显差别，则卷数的拆分应

① 以上各“属”前都冠有“右”字。

② 雍正《浙江通志》，第23页。

是基于平衡篇幅的考虑,对正文并不会产生太大改易。可见,由杭世骏编撰的《经籍》在成编之后或经他人的删削调整,但这种删削调整尚不至于如梁启超所说的“卒被局员排挤削去”那么严重。

四

既然目录类例并未大作调整,那么引发杭世骏强烈不满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从《两浙经籍志序》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杭世骏在总述批评者的“恫疑虚喝”时,就其理由是这样说的:“谓圣天子稽古向学,将按籍而开献书之路,封疆大吏虑不能尽应,以裨乙夜之览。至或郢书燕说、记丑而博,贻曲学之讥,来求全之责,解之不能,为累滋大。又或草莽之私史、孤愤之《离骚》,将吹毛以索疵,必伤桃而戒李。”^①即批评者提出了至少三点意见:一是担忧一旦“按籍而开献书之路”,会造成“不能尽应”的困局;二是认为收录“郢书燕说、记丑而博”类的著述将遭来“曲学之讥”;三是对“草莽之私史、孤愤之《离骚》”类的著述是否收入,持谨慎消极态度。基于上述三点而“肆意涂窜”的删削,造成的结果在杭世骏看来就是“艾儒魁士之述作,以疑似而见删;家猷国献之章程,因运移而并废”,这对杭世骏而言无疑是难以接受的。

杭世骏在《两浙经籍志序》中强调他编纂《经籍》的目的是“今欲网罗放坠,成一家簿录”,为达到这一目的,以至于“缙绅胥说,崔、张小文,审隅曲其可观,虽谗痴而必录”。这种“求全”的编纂原则,显然是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的启发与影响,正如杭世骏《黄氏书录序》中称赞黄虞稷“搜辑有明一代作者,详述其爵里,门分类聚,比于唐宋《艺文志》之例。予披览粗竟,窃叹俞邵用力之勤,而悲其志之不得试也”^②。在杭世骏看来,黄虞稷为编纂《明史艺文志》付出辛勤努力,是自己编纂《经籍》的榜样,但遗憾的是,黄虞稷“其志之不得试”的悲壮没成想也发生在了自己身上。

《浙江通志·经籍》最终成编,据杭世骏的说法,与其原稿相比,就是“艾儒魁士之述作,以疑似而见删;家猷国献之章程,因运移而并废。续凫断鹤,取笑通人,今世所行本是也”。由于杭氏《两浙经籍志》原稿未见传本,其与《浙江通志·经籍》之间究竟存在多大的差异,难以对比考察得出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删”“废”可能是删削了杭氏稿中一些存疑或是违碍的条目,但据此就说《浙江通志·经籍》与杭氏旧稿毫无关系,是“被局员排挤削去”而重新编纂的,则显然与事实并不相符。从上文对二者类目的对比可以看出,《浙江通志·经籍》与《两浙经籍志序》所说的类例完全相合,已经可以肯定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杭世骏著,蔡锦芳、唐宸点校:《杭世骏集》,第83页。

^② 杭世骏著,蔡锦芳、唐宸点校:《杭世骏集》,第88页。

of Xiong County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followed by local records with the same title compiled during the Reign of Wanli and Kangxi. There are also many comments in the book on Xiong County affairs at that time, reflecting the author's thoughts of records serving for practical purposes.

Hang Shijun and the Compilation of Yongzheng *Canons*, *Zhejiang General Records*

..... **Wang Xuanbiao** (47)

In 1731, Hang Shijun was invited to take part in the compilation of *Zhejiang General Records*, responsibl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anons*. But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his manuscripts, there seemed to be quite some criticisms from his colleagues, which led to Hang's great annoyance. Hang intended to publish his work "as a separate piece" under the title of *Zhejiang Canons Records*, which unfortunately had no extant copy. Scholars in later generations were mostly sympathetic towards Hang's misfortune. Liang Qichao even took the view that Hang's manuscripts "were pushed aside and cut out by members of the compilation bureau". However, through comparison of the *Preface to Zhejiang Canons Records* with the categorical styles section of the current edition of *Yongzheng Canons, Zhejiang General Record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wo can be proved, thus Liang's view is not entirely reliable.

In Shunzhi Period Zhejiang County Records Compilation and Regional Order—A Case Study of the Four Counties of Songyang, Suichang, Longquan, and Xuanping of Chuzhou Fu **Xu Peng** (53)

This article takes four county records of Chuzhou Fu of Zhejiang during the Shunzhi Period as examples to analyze through textual interpretations the complex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groups and mentalities behind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in a chaotic world,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county records compilation to the restoration of regional order during this period.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clarify that the change from Ming to Qing Dynasty did not break up the tradition of county records compilation. On the contrary, the disorder of the real world provided the compilers with certain possibilities of overstepping the established practices.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also allow for the convergence of all sorts of resources in common efforts to restore and reconstruct the postwar society, bringing benefits for popular sentiments, local customs, and production, and gradually forming identification towards the new dynasty and culture.